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清初朱子学研究

——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

林国标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RENMINCHUBANSHE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清初朱子学研究

——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

林国标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林国标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9
ISBN 7-5438-3781-1

I.清... II.林... III.朱熹(1130~1200)-哲学
思想-研究-清前期 IV.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9196号

责任编辑:莫金莲
装帧设计:胡薇薇

清初朱子学研究 ——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 林国标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25,000

ISBN7-5438-3781-1
B·95 定价:18.50元

目 录

引 论	(1)
一、清初学术的主流	(1)
二、从儒学的沿革看清初朱子学	(9)
三、“清初朱子学”涵义的界定	(25)
四、清初朱子学研究的视角	(28)
总 论	(36)
第一章 明末清初儒学的大整合及朱子学的复兴	(36)
一、理学的递变及王学的式微	(37)
(一) 程朱理学的内在矛盾及阳明的解决办法	(37)
(二) 阳明心学的内在困扰及其后学理论的偏向	(48)
二、对传统思想的全面反思及多元化的学术格局	(53)
(一) 顾炎武的经世学风及其与清初朱子学的理论关联	(54)
(二) 黄宗羲对心学的改良及其思维得失	(62)
(三) 王夫之对理学的开新与保留	(68)
三、清初朱子学的兴起	(74)
第二章 清初朱子学的理论渊源	(82)
一、先秦儒学：清初朱子学的精神源泉	(82)

(一) 张履祥、陆世仪与先秦儒学·····	(84)
(二) 吕留良与先秦儒学·····	(88)
(三) 汤斌、李光地与先秦儒学·····	(91)
二、心学：清初朱子学的反面借鉴·····	(95)
三、气学：清初朱子学的有益借鉴·····	(102)
四、西学：清初朱子学的有益补充·····	(110)
(一) 陆世仪的“切用于世”之学与西学因素·····	(111)
(二) 陆陇其对接西学的接触·····	(114)
(三) 李光地的西学好尚及其意义·····	(117)
第三章 清初朱子学的理论旨趣·····	(123)
一、对儒学理性精神的继承·····	(123)
二、对朱学理气论的解构·····	(131)
三、为重建伦理秩序构建心性理论·····	(138)
四、格“事”“物”之理的“格致”理论·····	(146)
分 论 ·····	(152)
第四章 清初朱子学的“遗民”期——以张履祥、陆世仪为例·····	(152)
一、张履祥的“实践”之学·····	(153)
(一) 刻苦自砺，终身贫俭的一生·····	(153)
(二) “清代辟王学的第一人”·····	(155)
(三) “博文约礼”之学·····	(158)
(四) 致知在力行·····	(163)
(五) 明理在适用·····	(167)
二、陆世仪的“切用于世”之学·····	(172)
(一) “理一分殊”的新阐发——“识得分殊方是一贯”·····	(172)

(二) 人性理论的新发明——“性善之旨不必离气质而观”	(178)
(三) “格物致知”的新定位——“明体而适用”	(182)
三、“遗民”期清初朱子学的特点	(186)
 第五章 清初朱子学的“重塑”期——以陆陇其、熊赐履为例	(192)
一、程朱理学的卫道者——陆陇其	(192)
(一) “源流之辨”与“学才之辨”——尊朱黜王的两个方法论原则	(193)
(二) “明人身之太极”——对朱子学本体论的形而下诠释	(199)
(三) “内外交相养”——“居敬穷理”说的新包装	(204)
二、程朱理学的复述者——熊赐履	(208)
(一) 学统论	(209)
(二) 对程朱的“重述”和“重塑”	(215)
三、“重塑”期朱子学的特点	(221)
 第六章 清初朱子学的“官学”期——以汤斌、李光地为例	(227)
一、汤斌的“体用一源”之学	(227)
(一) 为王学一辩	(228)
(二) 重拾“心体”	(232)
(三) “于人事上尽天命”	(236)
二、李光地的“性”学	(240)
(一) “蔼然”“肃然”之理气——本体论的人性化	

解读.....	(242)
(二)“理即性”——对生命伦理的强调	(247)
(三)“知性明善”——“格物致知”论上的折中 倾向.....	(253)
三、“官学”期朱子学的特点	(256)
 余 论	(261)
 中文参考书目	(283)

引 论

对清代思想、学术性质和状况作精确的理解和说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社会群类的重新聚合，各阶层在变革中的重组，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以及民族之间的大分合，造成了这一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系统构成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因此，任何试图以单一的思想形式作为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代初年思想学术的标签的做法，都是不合历史实际的。

今人多以考据学（或曰朴学、汉学）作为清代思想学术的主要标志。然而，研究表明，考据学产生巨大影响只限于乾嘉时代，而即便是在那个考据学的黄金年代，考据学也有它特殊的地域限制和阶层限制。清代人观念上的实用化倾向，往往使得后人们容易忽略那个时代的真正哲学。

那么，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控制那个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是什么呢？

一、清初学术的主流

近人梁启超认为清初学术分为四种主要潮流——乾嘉学术、历算之学（自然科学）、程朱之学和颜李实践之学；钱穆则以新儒家的眼光，认为宋学的主脉在有清一代就未曾断过，当然就不用说其在清初的影响了；港台一些学者认为，清代学术是程朱理

学和考据学两条主线的平行延伸；也有人认为，不管是宋学，还是汉学或其他什么学，清代思想的主流是复归于孔孟儒学。

无论前人和今人怎样评判清代学术，有一点似乎没有被大家所忽视，那就是程朱理学始终像幽灵一般缠绕着清代人的头脑。换句话说，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程朱理学在清代仍顽强地延续着。

在清代的思想意识运动中，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换句话说，程朱理学对清代思想学术基础的建立以及日后思想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人们思维方式的建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看法是：程朱理学经过封建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到明末已经烂熟而走向衰落，特别是经过阳明心学内部的攻击和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大总结和大批判，理学到清初已是穷途末路。因此，清初是传统理学的终结点。理学之所以在清代还被人们提起，只是统治者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而采取的应急之举，并未在思想上实现对人们的真正控制。通常的看法也认为，清代是通过对王学的反动而走向汉学即经学，经学重考据，重实证，是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而那些鼓吹回归程朱理学的人们，似乎是在老调重弹，与时代进步的步伐不合拍，他们的声音只能被“回归原典”、“经学即理学”等时代强音所吞没。

实际上，如果客观地考察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实际，程朱理学在经历了陆王心学的打击之后，在清初重新抬头并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理性抉择。研究表明，无论是受众的多少、传播地域的广狭度，还是历时的长短，程朱理学在清代特别是清初还有着广泛的影响。

关于程朱理学在清初普及的程度，历史家的研究也许更具说服力。萧一山先生在其《清代通史》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清初之学术，几无一不为明学之反动，故其时之理学家，亦大抵力排明季学风者也。而其时承姚江余绪，为之收拾残局者，尚有孙奇逢、李颙及姚江书院一派。奇逢重实用，李颙重践履，教人切己反躬，注意日课，其学与明人已大不同，若奇逢门人汤斌、耿介等，则于程朱且日趋近矣。此清初王学大势也。此外，学者除王夫之与颜元二派外，则多自托于程朱之徒者也……夫之亦尊程朱，惟于张载则特别推崇……同时好谈理学，兼治经术者更有张尔岐，其学以程朱为宗，顾炎武称其为精于“三礼”，惟规模则不逮王夫之远甚，然亦足征清初之谈理学者，已日趋笃实矣。此外，以恪守程朱名者，则有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诸人。履祥尝从刘宗周问学，其后始尊程朱，深重践履；世仪之学，以格、致、诚、敬、修、齐、治、平为程序，以居敬穷理、省察克治为工夫，而致用之思想亦盛。陆陇其攻击王学不遗余力，卫道之精神极炽，清代言程朱之学者宗焉。光地论学以志、敬、知、行为序，又始治经术，而于历数亦精，惟言汉学者不之宗耳。至其时，置身显宦而兼以理学名者，汤斌、光地外，更有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诸人。魏等皆深于道统观念，而以程朱为宗，居权要之地位而提倡之，程朱之复盛于清初，虽由于明学之反动，魏等实亦有与有力焉。

其时更有谢文游、应枬谦、刘原禄、朱用纯等，虽立说与程朱不尽吻合，然大旨亦宗程朱者也。此外以程朱自命者，尚有李光先、范镐鼎、汪佑、劳史、李来章、张鹏翼、朱泮云等，亦皆笃于躬行者也。

清初承高、顾之绪，讲学东林者，有高世泰、高愈、张夏、吴慎、施璜、顾枢、彭琬等，其立言大旨亦

与程朱为近。祁州刁包尝与高世泰往复论学，当时有南梁北祁之称，所学亦与此派为近。

总之，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①

此段引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清初的学术大势。从中可以看出，清初的思想学术格局虽然驳杂，但具有一种复归程朱理学的总趋势。王学一门，虽承“姚江余绪”，但都做了“明学的反动”，为学旨趣已与程朱日趋接近；朱学一脉，无论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无不力排明季学风而恪守程朱。顾、黄、王诸大家虽不能算是纯粹的程朱学家，他们对传统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整肃，但对程朱理学并未全盘否定，如上面引文所说的，“夫之亦尊程朱”。至于游离于朱王之间者，虽立说与程朱不完全吻合，但立说者也无不以程朱之徒自命。

有论者认为，程朱理学在经过王学及其异端的攻击以及明末清初诸大家的批判之后，已缺乏说服人心的力量。清初虽通过政治力量人为地抬高程朱之学，但并未能阻挡其走向衰败的命运。也就是说，在清代程朱理学只变成了一些毫无生命力的政治口号，而作为一种理论，已缺乏起码的逻辑力量和时代精神。因此，它已经终结。

应该承认，晚明王学异端如李卓吾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动摇了理学的理论基础，更破坏了理学以封建伦理规范来净化人心的道德目的。但以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而言，李卓吾的理论被接受的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明清之际，王夫之在理气观和人性理论上的新发展，也动摇了理学道德源于天理、天命的理论基础，使程朱理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使传统理学理论思维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4页。

的基本框架此时已显得过时。但王夫之的学说并未彻底否定传统理学，他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些理学的传统命题。更确切地说，王夫之是传统理学的批判性总结者，而不是对旧思想一概推倒重来的人。更何况王夫之的思想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根本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理学基本框架的过时，并不妨碍后来者运用旧的范畴去填充新的内容，去拓宽旧的理论的适应范围，去激活原有理论中有益的因素以延长其生命力。稍稍考察一下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史，表面上看去，此时似乎理学已处于停滞、衰落的阶段，实际上，其基本理论在社会上乃至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产生此时理学已经衰竭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此时没有出现像朱熹、王阳明那样盟主式的人物，没有出现一位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理论典型。但是这就好比足球比赛，有的球队靠球星的杰出表现，而有的靠球队整体的配合。清初的朱子学似乎靠的是朱子学者整体的力量。且不说直到清末科举考试被废除以前，科举基本上仍以宋、元理学家的四书、五经注作依据。就是清初的著名学者，包括通常所说的考据学家，很少有不受理学影响的。黄宗羲承王学之绪，而又借程朱之学修正王学；王夫之继张载关学之统而有发展，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但也保留了程朱理学的若干命题和思想；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反对空谈心性，对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转变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所标举的“博学于文”，实与程朱的“格物致知”相通，“行己有耻”则是理学家道德实践的同义语，故他对程朱都很尊重。此外，孙奇逢、李颀等遗民学者，虽宗陆王，但他们的思想已不复王学本来面目，而与程朱一脉相承了。

此外，这里还涉及一个思想史研究中对历史理论的评价标准和研究的视角问题。时人对历史上某种思想或学术流派的评价，大多依据的是一种“大传统”的标准，注重的是文化中的“大传

统”。依据的是今人的思考习惯和思维标准进行经典文本的解读。因而注重的是思想理论的原创性和新颖性，而对其历史的影响和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传播的范围，则有意无意地予以忽略。由于我们常常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用今人的标准来裁剪思想资料，且按照某种线性的逻辑标准来要求思想的进步性，这使我们的目光常常只聚焦于文化中的“精英类型”。实际上，我们从事思想史的研究，除了应注意“大传统”之外，还应当注意“小传统”，且应该有一种文化学的视野，而不是只一味地注重纯观念史的逻辑钩沉，对历史的思想类型进行随意的和主观性的取舍。

就清初考据学与理学的关系而言，也是更需要说明的。继顾氏而开考据之风的如胡渭、阎若璩、毛奇龄等也是或宗朱、或宗王，他们的考据对程朱理学虽都有破坏性，但在理论上并无突破。钱穆说：“汉学诸家之高下深浅，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深浅以为判。”^① 这准确地道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种技术性的考据之学，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离不开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深刻体悟与把握。清初，早期考据学兴起的动机实际上是缘于一种寻觅儒学真谛的冲动。当时的人们以为思想的歧异缘于对儒学经典解读的歧异。因此，考据学家试图确立一种权威的解释范式以保证儒学的纯粹性。这本身无疑是一种理论建构的活动。至于后来学者因技术兴趣而走向纯粹的考据学，只是一种侧重点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汉宋之间有一条彼此隔绝的鸿沟。

乾嘉时期，考据学号称盛极一时，治经重汉人经注及《说文》、《尔雅》，号为汉学，体现了一种浓厚的儒学复古倾向。但他们的发现主要在名物、制度、音韵、训诂等方面，还有的兼及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天文、地理、算学，始终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思想理论以与宋学相抗。真正能通过考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早期儒学面貌，或者说在宋明理学之外重建新的儒学理论体系的人则不过戴震等数人，而最能与理学家相对抗的则只有戴震。然就是戴震，其早年还分学问为三：义理、制数（考据）、词章，而把义理之学归之于程朱之学。^①由制数（考据）而在义理上有新的创获，在程朱之外另张一帜是其晚年的事。且他的新理论在当时是得不到学术界公认的。“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②这就佐证了考据学即便在它的极盛时期，其声势并未彻底盖过程朱理学，它还是受到它所传播的阶层的限制。

钱穆在谈到阎若璩考据学的理学尾巴时，说道：“潜邱之意，仅欲以汉儒之博物考古与宋儒之理明义精者相阐证，对宋儒义理，未敢异同……然潜邱攻朱，只在名物考据，故后人谓《四书释地》曲护紫阳。至于义理，固不变其遵信之态。”^③实际上，考据学与程朱理学并不是没有相通之处，清代虽以汉学为名，其实亦是程朱一系尊经笃古之流风，只是把尊经笃古的范围缩小于名物训诂之间而已。考据学只是树立汉学穷经的旗帜，贯彻宋儒读书之精神而已。所不同的只是考据学治经的方法得到了改良。宋儒以来，学者考古研经，每每主观用事，更改古书，有望文生义之弊，而考据学用客观的方法以止其失，颇似近代的科学精神。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谈到考据学的学术价值时，亦

①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6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3页。

指出其特点与成绩在于“以文字声韵为基础，搜集辑录大量资料并对古代经典作综合深入的分析，不凭臆断，不制造伪证，对古书和古代典制能纠正前人之误，得出较正确的认识，这是清代考证学的特点与成绩”^①。可见，考据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从理论根基上动摇了程朱理学，说到底，它只是对宋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而已。

毫无疑问，考据学对中国的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它基本上是治经方法的改良和发展，而探寻儒学的真正义理的学术目的，则与程朱之学具有相通性甚至一致性。可以说清初的学术的主流仍然是复兴的程朱理学。

当然清初复兴的程朱理学并非宋学的简单重复，而是融注了某些新观念的朱子学。如果不仅仅是为了强调理学思想运动本身的连贯性和思想学术的渊源关系的话，把清代的理学看做是“程朱理学在清代的延续”是不确切的。实际上，程朱理学之在清代已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形态，即向旧有框架灌注实用、经世内容的经世理学形态。面对新的历史情势，任何旧的理论也不能不进行自身的调整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此时，理学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清代新理学对传统儒学的理性原则、入世精神和经世观念进行了尽可能的强化。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文重建运动中产生的思想学术形态——以“事理”为中心的经世理学形态。

我们也可以说，清初的理学是儒学在中国社会史上的最后一种表现形态。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观念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程朱理学经过特殊历史时段的酝酿之后的理学新生态，即清初朱子学。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清前期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4 页。

二、从儒学的沿革看清初朱子学

明白了清初学术的主流是清初朱子学，还必须进一步明白，从儒学的历史演变来看，清初朱子学在多大的程度上保存了儒学的基本价值，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扬弃了旧理学的过时的观念，也就是说清初朱子学是怎样延续了儒学的基本生命之线的。这就需要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对儒学生命之线的延续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在中国哲学中，儒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学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派别。如果说先秦的儒学还是与他家并驾齐驱的学术派别之一的話，随着历史和思想史的演进，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学术派别，而是历朝历代统一民众的思想信仰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理论和价值判断经过历史浪涛的洗涤之后已积淀成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

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势，中国儒学的演进过程，除了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之外，更与政治的运作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思想为政治服务的特殊使命，儒学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地满足政治和思想现实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为芸芸众生提供统一的、权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而不断地被阐释的过程。从先秦至清代，儒学处在不断的被阐释的过程中。儒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判断和理论形态，也被不断地保留、充实、更新和扬弃。经过这种不断的扬弃的过程，形成了一整套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成了中华文化的巨大的磁场，在漫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思

想观念，都将被这个巨大的磁场所吸纳。

按照以上的思路来考察儒学的演进过程，我们认为，儒学在历史上分别表现为四种理论形态：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新理学（清初朱子学）。

先秦儒学是中国哲学的根基，孔子作为儒学的开山祖师，摆脱传统天命观的束缚，重新理解天人关系，重新诠释人的含义，把天虚置而更重人事。这种观念对以后儒学的基本观念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日后儒学的发展过程，尽管各期的理论形态不一，但重人事、重人伦，对现实采取理性主义态度则是儒学思想的一贯原则。

孔子通过崭新的人学理论奠定了其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山鼻祖的地位。我们如果较仔细地比较《论语》中的有关论述，就会发现，《论语》的中心是探讨人的问题。“人者，仁也。”“仁”成为孔子思想最有特色的亮点。在孔子的思想中，“仁”的意义比较复杂。《论语》中有关“仁”的说法有 109 种，然最主要的意义不外乎三种：一曰“克己复礼”。“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把道德规范、社会规范这种历代相传的社会手段视为“仁”的表现形式。对于当时的社会伦理作了哲学上的提炼、升华，寻找一种普遍化的人文精神。二曰“人者，仁也”、“仁者爱人”^①。主张把他人作为自己的同类看待，表现了原初的人道主义观念。同样表达了一种人文价值追求。三曰“孝悌也，其为仁之本欤”^②。孝悌，是一种基本的家庭伦理规范，孔子把它看成是“仁”的本质。从孝悌到复礼再到爱人，孔子“仁”的内涵无非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手段（主要是伦理道德的调节手段）来达到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与宇宙的和谐状态。因此，他所注重的是人怎样才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学而》。